



爲一個軍事的方  
法。

自由，是目前抗日民衆的要務；但不能

翻國民黨——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統治，這種自由便不能恢復。因此，民衆必須集合

力遙去推翻國民黨政權，並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以建立民衆的政權。如此，革命分子應該深入民衆中去，喚起他們，組織他們，告訴他們打倒國民黨爭取抗日自由之必要，和召集國民會議建立民衆政權的必要。

但在現階段的中國，國民黨的欺騙方法的周密，與武力壓迫的殘酷，已決非散漫的羣衆組織所能抵抗並獲得勝利。無革命政黨領導的羣衆運動與羣衆組織，將被國民黨所破壞。近幾月學生青年在農村宣傳中之遭受迫害與阻礙，並難收大效，即是好例。所以目前革命先進者的責任

第四國際綱領來創造。在目前抗日運動緊急時期，我們還須創造新黨來領導這運動。真正的革命黨只有根據着馬克思主義的第四國際綱領來創造。在目前抗日運動緊急時期，我們還須創造新黨來領導這運動。自然是不幸的事，但這却是惟一的走向勝利的道路。

反對國民黨的「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及「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爭取民衆抗日的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罷工、罷課的完全自由！」  
打倒賣國降日的國民黨、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建立民衆政權！  
創立革命政黨領導一切革命運動！

## 中國「紅軍」往那裏去？

沉靜已久的中國「紅軍」運動最近在蘇聯關係的緊張中，又在山西活躍起來，《紅軍》的前途問題，又成為一切革命者思考的中心了。

對於這所謂「紅軍」，我們曾經一再地說明過我們的立場，我們認為在土地問題的關係上，又在山西活躍起來，《紅軍》的前途問題，又成為一切革命者思考的中心了。

太林黨的幻想，以為單靠紅軍來『完成革命』，來『建設社會主義』！  
我們在開始就這樣主張過：農民鬥爭應該成為整個民主鬥爭中的一個力量，無產階級的黨應該用革命的民主口號及其政綱，即以普選的全國民會議口號，來吸引工人重進政治，並將農民鬥爭與民族解放鬥爭聯繫起來，使其成為集中的反國反帝的革命怒潮。我們相信只有如此，農民的革命力量，始終是中國無產階級在其革命鬥爭中的一個可靠的支軍。無產階級的政治黨應該領導他們的鬥爭，使他們的運動

成為反國民黨與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但同

時，我們又不斷地警告過：農民的暴動，無論他是怎樣的革命，牠始終還是小資產階級性的，即是說，牠的目的在於獲得私有財產而不能反對私有財產，因此，農民暴動如果得不到無產階級在政治鬥爭上的領導，則其發展的前途究竟是否有利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仍屬疑問。假使在工人消沈的條件之下，幻想農民的隊伍為『工農紅軍』，且幻想在他們的佔領區中『建設社會主義』，那不僅是自欺欺人，抑且是對於革命的罪惡！

幾年來，工人階級仍未脫離其消沉狀態，而農民的武裝隊却仍能繼續存在，有時甚之還能相當的發展。這一點證明了反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決沒有力量用自上而下的方法來解決土地問題，但不能證明這些隊伍已經成爲真正的工農紅軍。

我們——布爾塞維克——列寧派——從來不會輕視過農民鬥爭的力量，但我們堅決地反對以農民來代替工人。我們更反對更

迨去年共產國際七大之後，中共採取了所謂新政策，中國「紅軍」，簡直僅僅成

為蘇聯外交政策的一個工具了。牠愈來愈失去其對於中國革命的意義！

因日本帝國主義之加緊大陸侵略，蘇聯

感受到莫大的威脅，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史大林黨就採取了一個無恥投降的路線。

牠幾年來幻想單靠這「紅軍」來「建設社會主義」，結果是文滅了，回頭牠就根本不相信牠那革命的力量，於是想拿牠來做與蔣介石勾結的條件。且冒險地想拿這個力量來做抗日的前衛。

對於這個估計，一切誠實的工人與共產主義者會說我們只譴責的吧！那就請看「紅軍」的「快郵代電」。

這個電報是打給「南京總司令，泰山馮總司令，太原總司令，長安張副司令，廣州陳總司令，廣西李總司令等等」的。

牠的中心內容爲：

「（一）中國同胞，無分階級派系，莫不

受此慘痛；（二）中共號召全國同胞對外應援。」

牠正式宣言，無論國防政府在何種方式

之下成立，我們必定竭力擁護，無論抗日

聯軍在何種形式之下組織，我們決定首先

加入，而且願意與任何真正抗日的軍隊親密合作；（三）我們進一步號召全國同胞激發愛國天良，拋棄一切內爭，一致團結。

（四）全文見蘇聯大林黨出版的《人民須知》。

這樣的一個授權文件，我們在古今中外

可見史大林黨始終不了解我們這個主張

，他們完全受着農民落後思想的影響，他們把中國農民固有的「割據稱王」的老套，翻譯成史大林主義的新名辭；「一者或數

二二六的東京政變，已經不流血地結束了，這結束不過是日本政治發展過程中的

一個劇變之終結。其後果將不僅對中國和

日本，並對全世界亦將發生嚴重的影響。

我們擁護中國農民革命力量，高聲抗議

日本，並對全世界亦將發生嚴重的影響。

我們擁護中國農民革命力量，高聲抗議

日本，並對全世界亦將發生嚴重的影響。

中國「紅軍」在愛國主義的白旗之下，向蔣

總司令投降，同時又恐不蒙收容於是即召

人們「激發愛國天良，共同禦侮」。這真是

可恥到了極點，可憐到了極點！

最近「紅軍」在山西的活躍，一方面證明

「紅軍」中主要的部隊還是英勇鬥爭的分子

還遵循着所謂「國際路線」，即史大林黨的

官僚們想長驅北上，與外蒙打通，把這一

點中國農民革命的精華，罪惡地送入日本

帝國主義的砲口之中去！

本來在保護蘇聯與爭民族解放的戰爭中

，「紅軍」當然要起極偉大的作用；但正因

爲此，我們反對把牠作冒險的孤軍奮鬥，

在日蘇戰爭實際爆發之前，或在國內沒有

取得大多數民衆抗日的聯絡之前，這一點

武裝力量決不能拿去作孤注之一擲，假使

人們的記憶消逝吧！

由此看來，史大林黨的「新政策」如果堅持下去，將導引中國「紅軍」到兩個可能的

軍人，很可以於日軍的夾攻之下，將牠消滅；吉鴻昌方振武的前例，想來還不會從

人们的記憶消逝吧！

「紅軍」再向內蒙或綏寧突進，中國的反動

悲慘結果：（一）蔣總司令「激發了愛國天良」，收編了紅軍（因為在任何方式之下

都能合作，則收編當然也能接受）；（二）

向日軍的勢力單獨突進，遭受消滅！

我們擁護中國農民革命力量，高聲抗議

自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以來，日本的經濟愈趨集中，而財閥的力量，因犧牲着無數中小資本的利益，尤其以加緊剝削工

人及榨取農民的方法，愈加趨於鞏固，其

結果則普遍地引起了工農與小資產階級群衆的不滿。因此，對於財閥御用的兩大政

黨，也就更加厭惡起來了。這時如果有一個強大的無產階級的政黨，那牠一定能夠聚這一大批不滿的工農與小資產羣衆，掀起革命的巨浪。

但因日本無產階級政治覺醒的落後，以致尚無強大的工人政黨，而日本原有的無產黨，則只限於改良主義的政綱，決不能擔負起這一偉大的歷史任務，至於史大林黨則可恥地追隨在這些改良政黨的後面，不能起一點作用。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這一個反財閥反政黨的普遍的不滿之感，就只能在特殊組織的軍人中反映出來了。日本實行着徵兵制，現役軍人差不多全是城鄉小資產者與工農子弟，他們深深地感受到農村破產與一般經濟恐怖的痛苦，於是育着一種對現狀不滿的情緒，這一個情緒，和他們的落後思想即忠君愛國的所謂「大和精神」混合起來，就構成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根源。

這種不滿被陸軍上層的一些野心者所利用，他們一方面在口頭上同情於不滿現狀者反對財閥的論調，並藉此去打擊那現在

還不被財閥所放棄的工具——政黨；另一方面告訴他們在向外的侵略上可以解決他們的痛苦問題。因此，日本的少壯軍人，以及上層的一些軍官，成了日本法西斯主義底唯一支持者。

在日本，財閥方面的固然滿心願意，但如過分增加他們負擔，及挑起一些不必要的衝突，他們也是不願的。所以在這次的總選舉中，民政黨還能有相當的勝利，而二二六

的政變，也就在這一個情況中爆發出來。

這次政變的結果，究竟日本的法西斯會有怎樣的發展，其主要的關鍵還在於財閥

統治實現時那樣緊張，即日本還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威脅着財閥的統治。

但這也不是說：「法西斯已到了回光返照」的時候了：因爲日本資本主義的本身既無法克服其矛盾，牠只有靠向外的侵蝕。



一九三五年夏，丁皆爾斯特德拉刑期完滿之後從索洛夫斯克被充軍到亞爾馬亞達，克拉斯丁被充到托洛漢斯克。我們必須

用盡一切方法把政治犯從集中營解出來，而且不讓他們再往那裡送。

### 三、反省院與流放地的幾個特點

在凡爾興烏拉爾斯克反省院的獨人監中，現在居住着齊諾維夫派的重要部分（齊諾維夫，加米涅夫，庫克林，查留斯基還有斯米爾加），工人反對派的著名領袖們，亨利亞普尼可夫（重病相聲），和「民主集中派」領袖麥德維德耶夫——他是一九一七年十月莫斯科運動的指揮者，列寧在當時的前中央委員會書記——老工人布爾塞維克地木非沙普朗諾夫（他病得很厲害，除非歐洲無產階級把他從反省院中救出，他是不會熬過他的五年刑期的）。

齊諾維夫派的行動方式一般地都是投降的，不過程度與方法各有不同。齊諾維夫本人大半都忙於研究法西斯問題（他帶了大批關於法西斯的書）和俄國形勢史。加米涅夫是百分之九十八半同意於總路線的。有人認為一切事都過去了於是一切必須從頭開始。加米涅夫又經過了一次新的審判，結果被加判了十年徒刑。第二次審判是因為有人控告，說他陰謀反對「他自己」（即史大林）。這控告的主要英雄是加米涅夫自己的兄弟，畫家聰森瓦爾。被控者共三十六人，這是一種混雜並極其可疑的羅致。結果兩個人處死刑（一是格柏烏的人員，二是克蘭姆林的守衛之一）。其餘都被判了五年到十年的徒刑，一部分被送到凡爾興烏拉爾斯克，其中大部分都是克蘭姆林的僕臣）。加米涅夫根本不認他與被控的事有關，並說他在受審判時所看到的這些被控告的人都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他的兄弟在審判時宣布說，幸而他被捕的早幾分鐘，所以這個「災禍」便因而得以避免了。這個有名的兄弟被送到別的地方。在凡爾興烏拉爾斯克找不到他。因為加米涅夫根本不承認他知道這種事，他不但增加了約十年的刑期，並且還被送到普遍監房里（反省院北廊第三排第五十七號，十二個人住一個大監房）。我要再說到社會革命黨的佛爾克斯，她是陸軍大學的科學助教。她在亞洛斯拉夫反省院的祕密室中過了五年，她失掉了她的說話能力的一部份，後來才轉到凡爾興。在凡爾興的反省院中還有二十個右派反對派分子（斯列普諾夫，亞斯特羅夫等）。流亡從前是在那里的，現在是否還在我已不知）。還

到五十個布列派。

一九三五年他在蘇士多佳滿了他的五年刑期；他在奧拉拉僅僅自由了半個月，現在他因別案又被判了五年，監禁在蘇士多。

前少共國際的書記佛雅佛山維契，也在那裏。他的妻布泰斯克雅則在凡爾興院中（與她的妹妹恩希里奇在一處）。利用着犯人管理員的更調，當局又改惡了合法的待遇，與犯人的口糧額。吃不飽的口糧又被減削了，特別是在亞洛斯拉夫與凡爾興的反省院中。當第二五年計劃中建築工程減少時，失業在流放人中間成了日常的現象。我曾在葉尼色士克過了半年，那裏的流放者的半數竟活生生地餓死。新到集中營去的

已無時間使我們多談這一方面的情形。一兩星期後我將個別地詳談這些。現在我只總括幾句說，在凡爾興烏拉爾斯克，政治生活是很緊張的，大堆的文章時常討論蘇聯社會生活的各種問題，並討論到一九三〇—一九三三年間國際政治上的主要問題：如法西斯主義與德國。各派各支派都發表有系統的刊物（手寫的）。常舉行大的討論會。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布爾塞維克列寧派發生了分裂，組織生活陷於混亂。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意見又轉於

二點鐘，有的甚至要做十四或十六點鐘，吃飯亦要伴機器。工作時監督極嚴，稍有不到之處，罰款、充公、開除都是司空見慣；如果與之爭理，則即遭資本家走狗的拳打腳踢。（例如大康紗廠工人梅世鈞無辜被打死）過去要三人做的事，現在加給一人做，（東洋廠甚至十數個人做的事）現在加在一人身上。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低。因此失業工人有增無減。資本家利用失業工人的競爭，更變本加厲的壓迫與剝削。他們不准工人看讀自己的刊物，不准工人組織工會；有的工人簡直

忽然大會被當地黨的領袖

指使齊諾維夫派分子。在這事件中，齊諾維夫明顯地追逼並強迫齊諾維夫派分子，現在這全體犯人都已被監禁了三個月，亞洛斯拉夫與蘇士多的反省院中，還有各黨各派的政治犯人。在蘇士多院中有「民主集中派」的第二個領袖，斯米爾諾夫。

諾維夫派為此事件了一個一般聲明給蘇聯的檢查法官。在此事上又發現當地的格柏烏是遵照着莫斯科訓令中的辦法而行動的。

諾維夫派為此事件了一個一般聲明給蘇聯的檢查法官。在此事上又發現當地的格柏烏是遵照着莫斯科訓令中的辦法而行動的。

在這全體犯人都已被監禁了三個月，

審問早已完結只等待着莫斯科的決定。

怎樣應對莫斯科寬待充軍的人們，怎樣

安撫。我已決心盡我一切能力去設法解救那些問題日夜圍繞着我的思想，使我不能

安撫。我已決心盡我一切能力去設法解救那些問題日夜圍繞着我的思想，使我不能

安撫。我已決心盡我一切能力去設法解救

那些問題日夜圍繞着我的思想，使我不能

安撫。我已決心盡我一切能力去設法解救

那些問題日夜圍繞着我的思想，使我不能</